

·真理的求索·真理的求索·真理的求索·

——·真理的求索·

孙长江 ●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鉴平
封面装帧 范一辛

真理的求索

孙长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08,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0499-4/B·88

定价 5.20元

写在前面的话

这里收集的四十多篇文章，除个别篇章外，发表的时间正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如果从文章本身的分量而言，说实在的，我羞于拿出来，再让读者们去浪费时间。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作为一个学习和信奉马克思主义——虽然经常被一些人填入异端的行列——的人来说，我却很有一点激情，想把它们集中起来，保留下去。这样作，不是为了鉴赏，而是为了记录。

因为是记录，就要求忠实于历史。因此，有些文章，现在读来，虽然肤浅得可怜，本不该收入集子的，我还是把它们放进来了。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真实的。

这个集子，分成五编。第一编，“实践与理论”，实际上说的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问题。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发表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到一年的时候。题目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文章却是用语录组织起来的。这本身就不是一种好的文风。然而，回想当时的情景，要不要用语录中的一句“如果每一句都照搬，包括马克思的话，那就不得了”，都费了许多考虑呢！那是在“凡是”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候。青年朋友们一定

会觉得可笑,但当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这一编中的《马克思主义遇到的三个挑战》,原是一个即兴发言,由一位朋友介绍给《新时期》的一位编辑。可以说,是在这位热心肠的编辑同志的“逼迫”下,写出来的。1983年那一阵子,据说被说成是一篇“打擦边球”的文章。至于说到《改革的实践呼唤着理论的繁荣》,那命运就更加可悲了。这本来是一篇受人之托,为一个会议而写的述评,当时据说“写得不错”,到了1987年,却构成了一个罪状了。

第二编,“人民与党风”,写的是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大部分发表在1978年到1982年这一段时间,有些还是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发表的。这可能是思想界的最佳时期了。所以文章虽然也不乏尖锐之辞,终究平安无事。

第三编,“知识分子与双百方针”,讲的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其中《用人与度量》,对毛泽东同志常说的,要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人,善于团结反对过自己又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这一思想,作了新的解释。包括题目用的是“度量”二字,当时都颇有一些朋友为此而捏一把汗。但是,真正惹出麻烦的,却是1986年“文化热”中,写的几篇文章。《文化发展和“兼容并包”》是一小段发言,摘登在《文汇报》上,据说,被看成是“全盘西化”的;《学术争鸣中不应有“裁判员”》,则被认定是“不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在学术争鸣中当“裁判员”!我真不知道,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党的领导究竟是什么含义?);而《一个方针,两个联系,三个课题》这一个大会议发言,则干脆被当成了“材料”,并且“理所当然地”取消了编入这个大会的汇编里去的资格。究竟这个发言讲了些什么呢?请读者们自己看吧。

第四编,“历史的经验”,写的是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记取历史教训。其中《历史是人民写的》写于1982年,本来报

纸已经拼好版了，但终于没有发出来。直到1986年才在上海的《书林》上，作为现在这本小册子《真理的求索》的书摘发表了。原以为这本小书就要出世了，没料到，天有不测风云，又搁浅了一年。《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经验的态度》这篇文章，我是含着泪写的。我们的历史教训太沉痛了，而更加令人沉痛的是，我们对于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竟是这样地不能够认真地吸取！《当作一个时代来研究》，形式是一篇书评，实际上讲的是怎样认识资本主义文明的问题。《经学与中国文化》，则讲的是怎样认识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它的经学方法，是怎样地死死缠着我们的民族。

第五编，“真理的风波”，主要讲的是1984年的一件小事。但是，对于真理问题，对于强调实事求是的这场讨论的历史，竟发生了这样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如果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道理在，真正是有点讽刺意味了。作为一种教训，我把它记录下来，并且附上一些别人写的有关材料。

这就是我的十年的历史记录。感谢党的“十三大”，使得我有机会来作这件工作。今年正好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十周年，我重新读了这些在这十年里所写的东西，实在是感愧交加。1988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 my 《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作为一种概括，我把它收到这本集子的前头，当作代绪言。为了说明我的心境，又写了这一段话，放在代绪言的前面，叫做《写在前面的话》，也许有助于读者对这些陈述的了解。

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

(代 绪 言)

十年前，我国理论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很快地就越出了理论界的范围，在全国得到强烈的反响。形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对于这场讨论，有些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觉得奇怪，他们问，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普通道理，为什么竟然引起这样大的争论？一些多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为什么竟然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抛到脑后，而且反转过来斥责坚持这个基本观点的人是“砍旗”、“丢刀子”、“反对马克思主义”？表面看来，这种现象似乎有些奇怪，其实倒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历史的转变时刻，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常见的，带有一定的规律性。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十分珍重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必要来重温这一场已经过去了十年、并且早已有了结论的争论。

历史的转变和朴素的真理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生在粉碎“四人帮”两年以后的1978年。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几个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这

就是：彻底清查和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和思想体系；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希望一批有丰富经验和很高威望的老同志尽快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但是，人民的意愿遭到了压制，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为借口，要求“继续批邓”，重申“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为对“四人帮”的批判设下层层禁区。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所谓“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提出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忧虑，事情很明白，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办理，那末“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能克服，人民的愿望就要落空。

1977年4月14日，邓小平同志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了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事业，反对“两个凡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和歪曲。在这个时期，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反对个人迷信、提倡科学民主、宣传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好文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报纸也陆续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并且举出事实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是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两种绝然不同的反响，一种是充分的肯定，一种是强硬的斥责。反对者加给它的罪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主席”。

针对这种谴责，邓小平在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极其精采极其深刻的回答。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呼吁，“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旗帜鲜明的言论，给了理论界很大的鼓舞。6月24日，《解放军报》接着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标准的种种责难。这一段时间里，邓小平在各种场合多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充分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意义，强调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

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在历史的转变时刻，一些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理，往往会成为争论的焦点。当马克思主义刚刚形成，还只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们的论敌争论的问题，首先便是指导工人运动究竟是靠来自实践并为实践所检验的科学理论，还是个别天才头脑中编造的教条式的药方。当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以后，这种争论就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进行了。每当工人运动中出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僵死的教条还是行动的指南就成为争论的焦点，而且照例是坚持前者立场的人要斥责坚持后者立场的人为“离经叛道”。

到了列宁的时代，这种争论更加激烈了。列宁重申马克思的名言，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特别气愤地批评考茨基“这类‘享有专利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运用这一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226页）。至于我们自己的历史，那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位连人要吃饭、打仗要走路都不知道的王明，不是也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攻击别人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吗？

在历史的转变时期，重温基本原理，除了论战的需要，还有教育人民的需要。列宁说过，经过了一场激烈的革命斗争以后，革命政党“不免要停顿一下，不免要回转去复习基本问题，不免要经过一番新的准备工作，好‘消化’那些极其丰富的教训”。列宁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无比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坚决、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定地再向前进”（《列宁全集》第17卷第25页）。我想，

这就是这种论战往往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的缘故吧！

开辟历史新阶段的十年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过去了十年。从1978年到1988年，这十年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怎样估价这十年的思想理论战线呢？赵紫阳同志在去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作了明确的科学的回答：“这九年，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开辟了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九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在拨乱反正基础上坚决推进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

“改革和开放，也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开始形成潮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九年之所以不平凡，所以举世瞩目，就是因为许多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新思想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体制的基础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奠定的”。

完全可以这样说：思想理论战线的这十年，正是许多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新思想不断冲击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并且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十年。如果不是这样，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好形势从何而来？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的开端。没有思想的再解放，就没有改革的深入。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方面和环节，改革不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在这种条件下，旧体制下长期形成的僵化思想、习惯势力和社会心态，必然会顽强地保护着旧体制。如果不是不断发扬适应社

会发展的新思想,不断克服保护旧体制的旧思想,要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可能的。

当然,对于形势的不同看法也是有的,这并不奇怪。新旧思想的冲撞是很激烈的,如果固守着受到新思想、新潮流冲击的旧观念,如果仍然坚持“凡是”的老立场、老观点、老方法,那末,就会得出与客观实际完全相反的结论。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有的人不顾社会实践的发展,神州大地凡是出现了和他头脑中那个“社会主义”模式不相一致的东西,统统斥责为“资本主义”;凡是和他头脑中固有的模式——也许还包含着个人利益相一致的东西,便统统尊奉为“社会主义”。已被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被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而一些束缚生产力的却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出于这种立场和心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个举世瞩目的十年,就被说成为充满着“资本主义”、充满着“大曲折”的十年了。在这种立场和心态下,思想解放、反对封建主义、反“左”、改革,统统被说成是为了“干资本主义”而打出来的“旗帜”。从这个角度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也可以说还在继续。

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

1987年5月间,赵紫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把已被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而把一些束缚生产力的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指出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接着,他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须统一起来加以考察。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否有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是判断进步还是倒退的主要标志;而实践则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更加明

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属于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指人们的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主观认识是否同客观规律相一致，只能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生产力标准，是指在社会领域内判断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上层建筑是先进的还是倒退的，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两者是有区别的，又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十年的实际说明，从实践标准的重新提出到生产力标准的提出，正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必然结果。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同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合，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坚持生产力标准，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领域中判断进步还是倒退的主要标志，当作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但是，怎样才能判断一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呢？怎样才能判断人们对于一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认识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呢？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人们的社会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总结了过去我们把发展生产力推到次要地位的沉重教训，明确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上来。接着，我国推行了全面的改革和开放，开始了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通过实践所要检验的是一种认识是否同客观规律相符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域中，所要检验的就是一种认识是否和社会发展的

客观规律相符合,这就必然要提出生产力的标准的问题。可以说,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从十年的发展情况看,也可以说,提出生产力标准,把它和实践标准统一起来,无论从实践和理论上说,都是一种深入,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划清了唯心主义天才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界限;强调提出生产力标准,则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种种空想的界限。同实践标准一样,生产力标准应该说也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但是,正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也被一些人忘却了。他们固守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原则,把它简单化、绝对化,变成为神圣的教条;他们固守着过去的那种社会主义模式加上自己主观随意附加给“社会主义”的东西,并且以此作为检验的标准,顺之者誉为社会主义,违之者斥为资本主义。上面我们已经讲过,十年前发生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是偶然的,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深刻反映。同样的,今天重申生产力标准,也正是今天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深刻反映。从实践标准的讨论到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的密切结合。这种结合,必将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巨大活力,促使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 * *

坚持实践的观点,就要坚持发展的观点。因为实践在不断发展。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理论的产生需要探索,需要创新;而探索需要科学的精神,创新需要理论的勇气。马克思主义需要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改革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今日的形势,要求我们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发达,立于世界之林。

2650/15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	---

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	1
------------------	---

(代绪言)

第一编 实践与理论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2
-----------------	---

加强认识论教育·····	8
--------------	---

认真调查研究 解决实际问题·····	17
--------------------	----

马克思主义遇到的三个挑战·····	19
-------------------	----

必须重新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	25
--------------------	----

用我们自己的实践回答新问题·····	30
--------------------	----

共产党人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36
---------------------	----

以高度的热情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44
--------------------------	----

改革的实践呼唤着理论的繁荣·····	54
--------------------	----

——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述评

坚持实践的观点就要坚持发展的观点·····	61
-----------------------	----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十周年

第二编 人民与党风

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	70
-----------------	----

不能忘记鱼水关系·····	75
---------------	----

给一位老干部的信·····	81
---------------	----

要有高尚的革命气节·····	87
----------------	----

——《李固传》给我们的启示

搞好党风是党领导人民实现四化的根本条件.....93

坚持党的领导 改善党的领导..... 101

爱护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111

端正党风的一个重要方面..... 115

——读《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

科学技术与人道主义..... 120

第三编 知识分子与双百方针

人才哪里去了? 124

用人与度量..... 130

一潭死水好,还是一潭活水好?..... 136

——论在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

谈“过激”..... 141

科学繁荣与学术自由..... 146

以崭新的精神面貌 欢庆我们自己的节日..... 152

坚持党对知识分子的科学估计..... 156

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158

坚持双百方针 促进科学繁荣..... 160

文化发展和“兼容并包”..... 162

学术争鸣中不应有“裁判员”..... 164

一个方针,两个联系,三个课题..... 168

——1986年5月13日在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的发言

认真研究国情 建设精神文明 172

——1986年9月在“上海双科学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第四编 历史的经验

要正确“消化”丰富的历史经验..... 178

历史是人民写的..... 186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经验的态度·····	196
当作一个时代来研究·····	203
——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经学与中国文化·····	211

第五编 真理的风波

说名·····	23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存目说明·····	233
一九八四年的“奖赏”·····	234
辨实·····	239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241
今天的理论工作者要“进入新境界”·····	246

〔附录〕

1978年4月27日孙长江同志修改的《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定稿·····	249
给光明日报社、杜导正同志函·····	258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写作和发表的经过·····	261
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纪实·····	269